

## 三禮館《永樂大典》輯錄稿的發現、定名及其來歷

張 濟

**內容提要：**《永樂大典》的輯佚是“大典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清代乾隆初年詔開三禮館，曾經輯錄《永樂大典》內的禮學文獻，然而長期以來，學界對其具體情況一直缺乏深入研究。事實上，三禮館《永樂大典》輯錄稿尚存於世，其主要內容既不見於現存《大典》殘卷，也是其他許多傳世文獻所未見的珍貴資料。而探索這一輯錄稿的收藏、保存情況，則可以對晚清以來清宮檔案、藏書的管理情況有更加切實的瞭解。

**關鍵詞：**禮館 永樂大典 輯佚

### 一

明代初年所編的《永樂大典》，作為中國古代最大的類書，自其修成之日起，即被當作“序百王之傳，總歷代之典”的集成之製。可惜此書卷帙浩繁，難以刊刻行世，當世多未之見，更多的祇是作為帝王的席上之珍，供其在“心潛聖道，志在斯文”之際，略加玩賞。明清易代之後，大量文獻散逸不傳，加以清初朝廷重視文教，翰苑儒臣多以博文為能事，殘存的《永樂大典》便成為學人輯佚的淵藪。

據統計，清代至今，學人自《永樂大典》輯出的四部典籍，總量幾達千餘種，其中尤以乾隆年間開四庫全書館時利用《永樂大典》輯出佚書最多，為數在 500 種上下<sup>①</sup>。四庫館之輯佚《大典》，的確是《大典》輯佚史上最有組織、最有系統的一項工程。後人於此，每多稱述，但對於四庫館以前的輯佚情況，則不夠重視。迄今為止，有關《永樂大典》輯佚史的論述之中，對時處四庫館以前者，仍以全祖望為大宗。事實上，全祖望非但自己輯有許多《大典》秘笈，還與一場頗具規模的官方輯佚活動有關。

全祖望的《鈔〈永樂大典〉記》言其輯佚經過甚詳，其中提到：

前侍郎臨川李公在書局，始借觀之（引者案：指《永樂大典》），於是予亦得寓目焉。……會逢今上纂修《三禮》，予始語總裁桐城方公，鈔其《三禮》之不傳者<sup>②</sup>。

類似之語，在全氏其他著作中也有出現，如：

雍正乙卯（引者案：十三年，1735），予於《永樂大典》中得之（引者案：指王安石《周禮新義》），亟喜而鈔焉。會修《三禮》，予因語局中諸公，令鈔

《大典》所有經解<sup>③</sup>。

再如：

方京師開三禮書局，同館諸公皆苦《儀禮》傳注寥寥，予謂侍郎桐城方公、詹事臨川李公曰：“《永樂大典》中有永嘉張氏《正誤》（引者案：指《儀禮識誤》）、廬陵李氏《集釋》。”二公喜，亟鈔之<sup>④</sup>。

三處所云，間或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在自述勸告三禮館臣抄錄《永樂大典》中的禮學著作這一點上，則絕無異辭。

三禮館是乾隆元年（1736）奉詔開設的一個書館，其主要任務是編纂《三禮義疏》，總結歷代經說，作為官方著作，以與康熙年間所修《周易折中》、《書經傳說彙纂》等書相配，共成“御纂七經”<sup>⑤</sup>。既然開館修書，則文獻資料的搜集，實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全祖望說三禮館“諸公皆苦《儀禮》傳注寥寥”，參與三禮館修書工作的杭世駿也曾對“京師經學之書絕少”的情況表示不滿<sup>⑥</sup>，兩人所說，當屬可信。這一現實使得三禮館從《永樂大典》中蒐集禮學文獻變得不但可能，而且必要了。

眾所周知，目前已知存世《永樂大典》僅佔原書百分之四左右，儘管比例不高，也已為學界提供了相當數量的研究資料。不過，依照四部分類法的觀點來看，現存殘卷之中，史部、集部書籍較多，而在傳統社會地位最高的經學典籍卻稍有遺存。如果三禮館在修書過程中曾經參考《永樂大典》，鈔錄佚書，他們可以利用的《永樂大典》資源，當然遠勝過我們今日所能見到的那一小部分。他們參考《永樂大典》所作出的成果，對我們今日瞭解《永樂大典》也應有若干借鑒意義。問題是，三禮館的資料，是否流傳下來了呢？

現存三禮館《收到書目檔》記載，在乾隆元年（1736）十一月初七，三禮館的收掌官父翰林院領取“《永樂大典》八十六套（每套十本）”，明年（1737）二月二十四日又領到“《永樂大典》五十六套零一本，共計六百五十一本”<sup>⑦</sup>。由此可知，當時館中纂修官員人等，確實聽從了全祖望的建議，檢閱《永樂大典》，以備纂修《三禮義疏》之需。依照常理，三禮館臣參考《大典》之後的所得，自當融入到後來的《三禮義疏》之中，遺憾的是《三禮義疏》全書並未標明何處引用《大典》。所以我們對三禮館與《永樂大典》的關係，仍沒有較為明晰的認識，只是籠統地認為當時曾經輯錄“《三禮》諸家遺說”，並根據前人記述，指出其中有唐人成伯瑜的《禮記外傳》的文字而已<sup>⑧</sup>。

## 二

2008年春，筆者至中國國家圖書館查訪資料，獲見《三禮義疏》稿本的縮微膠卷，在其中發現當初三禮館臣所錄《永樂大典》禮學文獻，不禁為之眼前一亮。

國家圖書館所藏善本《三禮義疏》共有三部，抄本二，稿本一。稿本在國圖善本書目中著錄為“經部·禮類”第1069號<sup>⑨</sup>：

《三禮義疏》不分卷，清任啟運、吳紱等纂修，稿本，五百四十四冊。

《周禮義疏》不分卷、《儀禮義疏》不分卷、《禮記義疏》不分卷。

筆者未見原書，通過縮微膠卷推知，此本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共五百四十四冊，封面有“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陽文印。膠卷顯示，拍攝時原件實物保存基本完好，個別地方有殘損、蟲蛀。圖書館編目人員曾對稿本大致分類，各冊封面均有阿拉伯數字流水號，從1至544，先《周禮》、次《儀禮》、末《禮記》，順次排列，每類之中，也略依本經，序以先後。原件謄寫文字有清整、潦草之分，可以推知這一稿本絕非一次性完成，而有複雜的形成過程，可以區分出草本、清本、副本等幾種形態。其中清本、副本間有句讀，而全本夾簽觸目皆是，眉批、旁批亦夥，塗抹修改不可勝計，書葉硃墨丹黃爛然。

這應當就是三禮館纂修《三禮義疏》時的稿本。

通常我們說的“稿本”概念具有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強調紙本書，即指“非紙本書的原始記錄形式不屬於稿本的範圍”；二，更為重要的則是強調，稿本的作者必須有在此之上形成書本的行為，至少是意圖。也就是說，“手稿是稿本基本形式，但並不是所有的手稿都可以稱為稿本。……有些手稿，並不是一部成書中的內容，這些手稿沒有形成過書本，就不能說是稿本”<sup>⑩</sup>。

在這一觀點的指引下來考察《三禮義疏》稿本，便不免會產生些許疑問。這個稿本之中多有與今本《三禮義疏》沒有傳承關係的文字，據筆者統計，其中至少有37冊與今本《義疏》存在差別顯著，恐怕不應當作《三禮義疏》稿本來看待。

然而，同時我們不得不注意到，這37冊內容與《三禮義疏》又有較為密切的聯繫：其一，此一部分與其他五百餘冊《義疏》稿本放在一起典藏，理應有所依據；其二，37冊內容皆為《周禮》、《儀禮》的注解，其中《周禮》之部25冊，《儀禮》之部12冊，《禮記》之部適闕，而今本《周官義疏》、《儀禮義疏》二書中引用的禮學文獻，往往見諸現存的這37冊《周禮》、《儀禮》注解當中。

詳細勘驗這37冊文本的內容，可以找到如下線索。比如，一冊封面題有“周禮天官壹”五字，下注“序官”二字，而正文起始則標有“永樂大典”字樣，另起一行題“天官冢宰第一”。又一冊正文題有“永樂大典”、“春官宗伯第三”等字樣。再如題有“永樂大典春官又貳”、“永樂大典士冠”、“大典燕禮”等等的字樣，屢見不鮮。

聯想到前人對三禮館抄錄《永樂大典》內《三禮》注解的記述，筆者恍然大悟，原來此三十餘冊內容，就是三禮館抄錄的《永樂大典》資料！

### 三

歷來言及三禮館對《永樂大典》的使用，都會稱之為“輯佚”，籠統言之，這並不算錯。現在既然發現當時的原始資料，應該對這一問題重新思考。

“輯佚就是將佚書（佚文、佚詩）現存的片斷材料加以搜輯、整理，最大限度地恢復佚書（佚文、佚詩）原貌的文獻整理活動和方法”<sup>⑪</sup>。如果以這一概念來衡量四庫館

的《大典》整理活動，合若符節。但三禮館的工作則與此有異。三禮館的目的，並不在復原《大典》收載的各種佚書，他們辛苦鈔書，祇是為了提供纂修《三禮》所需資料，其錄出禮學文獻仍基本按照《大典》原式隸於每條經文之下，而不是每部書籍各自成篇。因此，將三禮館抄錄的《大典》資料稱為“輯佚”，是不太合適的。為與輯佚相區別，張升界定了輯錄的概念，即“後人把某一時期某一方面或某人的散見於群書的資料輯錄成冊，為研究者提供方便”<sup>12</sup>。相對而言，三禮館的資料比較適用“輯錄”這一概念。再有，三禮館輯錄資料時並未想到要纂輯成書，館臣僅僅將之當作資料來看待。因此，筆者認為，將這三十餘冊資料定名為“三禮館《永樂大典》輯錄稿”是恰當的。

粗粗瀏覽這三十餘冊《永樂大典》輯錄稿一過之後，可知其中至少引錄有如下這些典籍：

《重言重意互注周禮》	王安石《周禮新義》
王昭禹《周禮詳解》	魏了翁《周禮要義》
史浩《周禮講義》	易拔《周禮總義》
朱申《周禮句解》	俞庭椿《周禮復古編》
林希逸《虞齋考工記解》	鄭宗顏《考工記解》
毛應龍《周禮集傳》	毛應龍《周禮或問》
魏了翁《儀禮要義》	李如圭《儀禮集釋》
張淳《儀禮識誤》	敖繼公《儀禮集說》
成伯瑜《禮記外傳》	陳暘《樂書·周禮訓義》
劉敞《七經小傳》	王應麟《六經天文編》
呂喬年《麗澤論說》	陳埴《木鍾集》
項安世《項氏家說》	章如愚《山堂索考》
《朱子語類》	黃震《黃氏日鈔》

其中雖有流傳至今者，但仍不乏佚文秘笈。比如王安石的《周禮新義》一書，在宋代影響極大，但隨後亡佚。至四庫全書館開，纔從《永樂大典》中輯佚出來。但四庫全書館臣的輯佚工作頗多疏漏，以三禮館《大典》輯錄稿與庫本《新義》互校發現，輯錄稿中可供補充、訂正庫本缺失的文字，多達百處以上。又如魏了翁《周禮要義》，是其《九經要義》之一種，但是宋元以後，幾乎無人見過其中的《周禮要義》，也是藉助三禮館輯錄稿，我們纔能對此書的結構、內容有一個大概的認識。史廣超認為“佚文之搜集，不能僅僅著眼於現存《大典》，應同時注意學者在其存世卷數較多時所輯各種佚書，從中搜集佚文”<sup>13</sup>，是從實踐當中總結升華得出的見道之言，切實可行，三禮館輯錄稿可為明證。關於三禮館輯錄稿的文獻價值，筆者另有《三禮館輯錄永樂大典經說考》一文，詳細論證，本文暫不涉及，下面將對輯錄稿的本末源流作一推測。

#### 四

三禮館《永樂大典》輯錄稿如何與《三禮義疏》稿本混在一起又入藏國圖？欲知詳情，就需要對乾隆年間纂修《三禮》的具體情況略加考索。

三禮館開於乾隆元年，是高宗特為纂修《三禮義疏》而設，綿延甚久，遲至乾隆十九年（1754）纔閉館。據鄂爾泰等編《國朝宮史》卷二十七記載，《三禮義疏》於乾隆十九年校刊<sup>15</sup>，即今日所見的內府刊本<sup>16</sup>。而《周官義疏》一書書前開列的纂修人員職名，其具體時間是乾隆十九年（1754）閏四月二十五日。可知至少在此之前，《三禮義疏》的編纂工作應該已經大體完工，隨後即正式閉館。清代修書各館閉館後續事宜如何進行，史有闕文，而書館關閉後書籍資料如何處理，則可考知。乾隆朝《會典則例》中說：

纂修《實錄》、《聖訓》、《國史》、《會典》諸書，……書成各繕三部：一呈御覽，一藏皇史宬，一貯內閣。惟《實錄》重繕清、漢文各一部，齊送盛京鳳凰樓尊藏。<sup>17</sup>

這是乾隆六年（1741）上諭所確立的修書完畢繳送成書的規定。其中規定《實錄》需要送往奉天，也就是現在熟知的紅綾本。這應當是針對《實錄》的特殊規定，而於他書，想必無此要求。《三禮義疏》修成之後，應該祇須進呈御覽並繳送內閣等處貯存即可。至於纂修期間編寫的稿本以及為修書收集的書籍資料如何處理，仍不得而知。方甦對清代書館作過十分細緻的研究，他認為“特開各館書成後，其進呈之本及稿本檔案，多繳藏內閣”<sup>18</sup>。三禮館正屬特開書館之一。徐中舒也認為：“內閣修書各館，往往因修書而徵集書檔，及纂修完竣之後，除正本進呈外，又例將所有的書檔稿簿，移交內閣收貯。”<sup>19</sup>那麼，三禮館的纂修稿本還有書籍資料亦應在乾隆十九年閉館之前上繳內閣。當然，考察有關文獻，則會發現，上繳內閣雖然是三禮館館中文獻資料的最大去向，但其具體途徑卻不是“三禮館→內閣大庫”這麼簡單。三禮館中的文獻資料在修書完工之後，至少有如下三個流向：

1. 直接繳存內閣大庫。內閣所藏書檔目錄，在民國間逐漸獲得學者的重視，據一份乾隆二十九（1764）年十一月以前的內閣東大庫的貯藏目錄殘本所載，當時的內閣大庫中即已典藏了三禮館的資料：

餘字號櫃

三禮館書籍<sup>20</sup>

內閣大庫有庫房兩座，在西邊的一座乃是紅本庫，在東邊的則分為書籍表章庫與實錄庫。這裏提到的餘字號櫃，放置在內閣東大庫樓上東首第三間，也就是在書籍表章庫內。這一份目錄所反映的大約是三禮館閉館十年之間的情況。所謂“三禮館書籍”，即指三禮館繳閱的書檔而言。從那時起，三禮館《永樂大典》輯錄稿便與三禮館

的稿本、資料放在一起儲存。

2. 轉往其他書館。內閣大庫的書櫃都分上中下三層，三禮館書籍能夠佔滿一櫃，證明交來的書籍不少，而這恐怕還不是三禮館書籍檔案之全體。在同一份目錄中，又列有“會典館交來書籍”的詳目，我們看到，其中很有一些是三禮館曾經使用過的書籍，如<sup>20</sup>：

《三禮編譯》九本不全

《禮記詳說》六十一本

《禮記纂言》十二本

《禮記哀言》八本

《三禮論》七本

《儀禮通解》四十本

《禮記擬言》十本

《儀禮節略》十二本

《霞光禮記》十本

以上幾種禮學典籍在前引三禮館《收到書目檔》中都可一一覆覓<sup>21</sup>，它們是三禮館纂修的參考用書，無可懷疑。其移送至會典館，大概應在三禮館修書將竣，無需再用之時。這類移送別館的書籍為數不少，雖然制度上要求別館閉館時也應將資料繳閱，但恐怕無法嚴格做到這一點。比如三禮館《收到書目檔》還載有《大唐六典》、《大明集禮》二書。此二書亦曾移送會典館，可是在現存的“會典館交來書籍”目錄內卻沒有繳閱的記錄。三禮館書檔尚有另外的傳播途徑。

3. 流散。除去繳存內閣與移送別館之外，三禮館的書籍檔案也有可能流入民間。乾隆四十六年（1781）閏五月十一日，盧文弨曾經見過三禮館副總裁方苞、纂修鍾琬刪訂的《周禮訂義》，據他說，這正是“脩《三禮》時所相與衡校之底本也。……而此一書適為烏程丁小正氏所得”<sup>22</sup>，此書後歸翁方綱。這本《周禮訂義》應是三禮館的工作用書流入民間者。這種情況有助於我們理解《大唐六典》等書為何沒有隨會典館書籍一同繳送內閣的問題。事實上，由於書館修書公私不甚分明，以及繳存之後儲藏不夠完善等原因，坊間的書館書籍時時可見。嘉慶中，法式善也自稱曾在廬甸書攤購得宋元人文集 55 種，“皆《永樂大典》中散篇採入《四庫》……未及校對之本”<sup>23</sup>。

三禮館內的文獻資料流向大致不出以上三種途徑，而仍以繳存內閣大庫為最主要的流向。不過由於資料的缺失，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之後三禮館《永樂大典》輯錄稿在內閣大庫的儲藏情況，我們無法確知，直到咸豐、同治、光緒年間，纔有略為可據的內閣書籍表章庫藏品目錄。不過這些目錄顯示，內閣大庫藏品的保存情況不容樂觀。即以三禮館書籍而論，其中就不見了“三禮館書籍”的蹤影。我們僅能根據某些蛛絲馬跡加以推測。比如書籍表章庫的一本目錄記載，數字庫夜字架下層有：

《禮記義疏稿》八十二本

號字架上層有：

- 《儀禮義疏》十九本
- 《禮記底本》五十一本
- 《禮記底本》八十本

巨字架上則有：

- 《周官義疏》五十本
- 《周官義疏》四包
- 《周官義疏》八本
- 《周官義疏》十本
- 《周官義疏》八本
- 《周官義疏》十本
- 《禮記義疏》一百四十三本

或言“稿”，或言“底本”，實即《三禮義疏》稿本。另外兩本年代較晚的目錄裏，原在號字架的《儀禮義疏》與《禮記底本》，轉移到了巨字架，而且“《禮記底本》五十一本”已改作“五十本”，似乎已有流失。而原本在巨字架上的書，有些卻跑到了號字架上層，還有些已經無法找到了<sup>⑤</sup>。除去上舉這些《義疏》及其稿本之外，內閣書目中還有許多禮學典籍，似皆屬三禮館繳閱之書，但並未歸在一處，而是隨意擱置。大庫裏面書籍挪動、流散的嚴重程度，於此可見一斑。儘管如此，這些清朝末年內閣書目著錄了《禮記義疏稿》之類的零碎信息，使我們有理由揣度，《永樂大典》輯錄稿仍留存在庫中。

光緒朝後期，內閣大庫的損壞日甚一日，到了光緒二十五年（1899），朝廷竟然要將內閣所藏檔案集中焚燬。宣統元年（1909），內閣大庫的書籍檔案都被挪到文華殿兩廡<sup>⑥</sup>，恰逢學部籌建京師圖書館，於是奏請將內閣、翰林院等處典藏的書籍全都移送該館儲藏<sup>⑦</sup>。學部所派負責揀選書籍的人，名叫曹元忠。事後，曹氏對此事有片段的回憶，剛好讓我們得以確認三禮館書籍這時候的流向：

憶往歲在文華殿檢勘書籍，見望溪充三禮館總裁時刪定纂修稿本，均藏內閣大庫，以視此冊，手跡宛然<sup>⑧</sup>。

這是曹氏獲見方苞《春秋發疑》手稿時所作短跋，因為見到方苞的手跡而回想起整理內閣大庫書籍時所見的三禮館稿本手跡。這一條隨意的記載是對三禮館稿本在清末從內閣大庫轉撥學部圖書館的重要證據。

幸運的是，學部接收內閣藏書的記錄也被我們找到。今國圖藏有一本《清內閣舊藏書目》<sup>⑨</sup>，其卷端題記謂：“今館中所藏內閣之書，均前清季年由學部發來，除殘缺外，有水濕者，有燻焦者，有霉爛者，大約失火時之受損耳。至清內閣書目，館中人均未嘗見也。”而這一部書目，則是1918年從學部檔案中抄錄出來的，極其珍貴。書

目計分四種：《庫存書目》三冊、《庫存殘書目》一冊、《殘復書目》一冊、《碑圖總目》一冊，而前三個書目中都可見三禮館稿本的身影。下面將有關記錄匯為一表：

內閣大庫移貯《三禮義疏》稿本表

清內閣舊藏書目 《義疏》稿本	《庫存書目》	《庫存殘書目》	《殘復書目》	合 計
《周禮》	一部，無卷數		一部，二十一本	21 冊以上
《儀禮》	一部，無卷數	稿本，存四十二冊； 副本，存三十四冊； 鈔《大典》本，存十一冊		87 冊以上
《禮記》	一部，無卷數	稿本，存八十一冊； 副本，存七十九冊	一部，九十九本； 一部，三十四本	293 冊以上

《清內閣舊藏書目》係交撥記錄，並非嚴謹的書目，所以上表所列與國圖今日所藏《三禮義疏》稿本難以一一對應。而且，在《舊藏書目》寫定至今的九十餘年中，《三禮義疏》稿本也許經過重新整理，分合或有變化。無論如何，《三禮義疏》稿本（包含本文析出的《永樂大典》輯錄稿）由清代內閣大庫遷入國圖，保存至今，殆無疑義。

我們注意到現存的輯錄稿僅有《周禮》、《儀禮》兩部分，缺少《禮記》。這種情況一方面很可能與清代內閣大庫混亂的保存狀況有關，即《禮記》部分在清代就已損壞、遺失。另一方面，內閣書檔轉交學部的過程，也過於倉促，仍有不少宋元善本和其他典籍、稿本留在庫中。後來這部分書檔有的流入民間，有的則轉入其他收藏機構。未來是否會發現三禮館《永樂大典》輯錄稿所缺失的部分，讓我們拭目以待。

#### 注釋：

- ① 曹書傑：《四庫全書采集“永樂大典本”數量辨》，《圖書館學研究》1986年第1期，第83—88頁；史睿：《四庫全書中永樂大典輯本目錄（含存目）》，《文津流觴》第四期；特別是史廣超《四庫館前大典輯佚書目》、《四庫館大典輯佚書目》、《全唐文館大典輯佚書目》、《全唐文館後大典輯佚書目》，見其《永樂大典輯佚述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
- ② 全祖望：《鮑塘亭集外編》卷十七《鈔永樂大典記》，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71—1072頁。
- ③ 全祖望：《鮑塘亭集外編》卷二十三《荆公周禮新義題詞》，《全祖望集彙校集注》，第1176頁。
- ④ 全祖望：《鮑塘亭集外編》卷二十七《儀禮戴記附注跋》，《全祖望集彙校集注》，第1279頁。
- ⑤ 關於三禮館的一般情況，可以參看林存陽《三禮館：清代學術與政治互動的鏈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 ⑥ 杭世駿：《續禮記集說·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01冊，第1頁。
- ⑦ 《收到書目檔》，方豈輯《清內閣庫貯舊檔輯刊》第二編，故宮博物院文獻館，1935年，第98頁A、第99頁B。
- ⑧ 史廣超：《永樂大典輯佚述稿》，第239頁。



- ⑨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85頁。
- ⑩ 江慶柏等：《稿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1—12頁。
- ⑪ 張升：《輯佚與輯佚學簡論》，《文獻》1995年第1期，第134頁。
- ⑫ 同上，第135頁。
- ⑬ 史廣超：《永樂大典輯佚述稿》，第235頁。
- ⑭ 《國朝宮史》卷二十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68頁。
- ⑮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編：《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第43—44頁。
- ⑯ 《大清會典則例》卷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20冊，第59—60頁。
- ⑰ 方旌：《清內閣庫貯舊檔輯刊敘錄》，《清內閣庫貯舊檔輯刊》，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1935年，第24頁B。
- ⑱ 徐中舒：《再述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中華書局，1998年，第359頁。
- ⑲ 《內閣大庫書檔舊目》，第68頁。
- ⑳ 《內閣大庫書檔舊目》，第70—71頁。
- ㉑ 《收到書目檔》，《清內閣庫貯舊檔輯刊》第二編，第98—102頁。
- ㉒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八《方望溪鍾蔗經兩先生刪定周禮訂義書後》，中華書局，1990年，第115—116頁。
- ㉓ 法式善：《陶廬雜錄》卷三，中華書局，1959年，第62—63頁。
- ㉔ 《校勘本書籍表章目錄》，《清內閣庫貯舊檔輯刊》第二編，第57頁B—67頁A。
- ㉕ 徐中舒：《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第295頁；王道瑞《簡述清代中央國家機關檔案的損壞與流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檔案與歷史研究——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六十週年紀念論文集》，中華書局，1988年，第121—134頁。
- ㉖ 《學部奏籌建京師圖書館折及附奏三件》，北京圖書館業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彙編1909—1949》，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6頁。
- ㉗ 曹元忠：《箋經室遺集》卷十《方望溪春秋發疑手彙跋》，1941年鉛印本。
- ㉘ 此書近印入《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第7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歷史系）